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CSSCI来源集刊

復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2019春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 主编

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PRING, 2019)

 復旦大學出版社

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

(2019 春季號)

復旦大學外文學院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9 春季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7-309-14448-2

I. ①复… II. ①复… III. ①语言学-国外-文集②外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H0-5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34994 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9 春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主编

责任编辑/郑梅侠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2 字数 369 千

201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448-2/H · 2917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 编：卢丽安

副主编：陈 靛

栏目负责：

文学文化：张 冲

语言学：沈 园

翻 译：王建开

本期编辑：

郑梅侠

编委：

曲卫国 孙 建

李 征 汪洪章

季佩英 姜 宏

姜宝有 郑咏滢

高永伟 谈 峥

褚孝泉 熊学亮

蔡基刚 魏育青

语言学

20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高校外语教育语种布局的移民

人口因素分析 宫同喜(1)

“脱欧”背景下欧盟语言规划的困境与出路 陈 宇 沈 骑(12)

韩国高校公共外语政策经验及启示 崔惠玲(22)

中国大学生英西双语动机探索研究 鹿秀川 郑咏滢(28)

中国学习者的第三语言塞音感知实验研究

——一项基于感知模型的分析 曾 婷 刘佳琦(37)

文 学

《幸运的吉姆》中的新类型“反英雄”及其双重美学形塑 张和龙(46)

美国韩裔文学——历史与现在 郭英剑 张国庆(52)

简·奥斯丁小说中的阶级流动性 苏耕欣(59)

肖像画、记忆与政治想象

——论《威弗利》的图像记忆书写 张秀丽(64)

论怀特海德《地下铁路》中的“后种族”书写 翟乃海(70)

《动物之梦》的时空经验与地方重构 胡碧媛 刘娜娜(76)

神话、反种族主义与创伤——《卡彭塔利亚湾》的书写策略 王福祿(82)

《北与南》中的正义主题 纳 海(88)

当代物化社会的隐喻：法国兰斯喜剧院的《吝啬鬼》 郭斯嘉(97)

重构理解主体——艾丽丝·默多克的阅读伦理 徐明莺 李正财(106)

从独一多样存在到艺术的多样性本质

——让-吕克·南希对艺术本质的本体论思考 王 琦 王 丹(114)

如何认识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中国叙事

——对两篇书评的回应与延伸 王升远(122)

引入·拓展·建构

——2018 年度中国叙事学发展报告 李亚飞 万晓蒙(129)

翻 译

- 莎剧名称汉译的生成与流变 朱安博 杨艳玲(137)
- 制度化译者探究 任东升 高玉霞(143)
- 后翻译研究时代翻译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根茨勒著《后翻译研究时代的翻译与改写》(2017)介评
..... 焦鹏帅(149)
- 《人间词话》中诗词碎片化所关涉的翻译问题 荣立宇 王洪涛(155)
- 特殊文学文体的认知焦虑及其翻译
——以《爱玛》中带引号自由间接引语的汉译为例 宫蔷薇(162)
- 场域·惯习·改写
——论《受活》法译本中的方言翻译 刘 曦 李牧雪(170)
- 论赤松的寒山诗翻译对经典的建构 秦 思 陈 琳(176)
- 经学、史学、东方学：19世纪英文汉学期刊对《尚书》的
译介 刘立壹(183)

20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高校外语教育 语种布局的移民人口因素分析

宫同喜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美国高校外语学习者与美国境内各语种移民的数量关系,发现移民人口是影响美国高校外语教育语种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当前美国社会,高校教授的主要现代外语大都是移民人群使用的祖语;在不同历史阶段,西班牙语等语言学习者数量的变化与移民人口数量变化的趋势整体一致;在空间分布上,各地高校不同外语学习者的数量与当地该语种的移民数量明显相关。本文提出,在国际交往、国家安全、语言自身价值等维度之外,移民人口因素也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影响美国高校外语教育语种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

Abstract: This article,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that of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language backgrounds in the whole country, finds that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d in American colleges are influenced by immigrants' makeup in America. Th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s of learners in U.S. colleges are also the most spoken ones in American families; historically, the rise and fall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at different periods corresponds to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immigrants speaking those languages; geographically,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correlate with that of immigrant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mmigrants, apart from the generally recognized factors such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agmatic usefulness, constitute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foreign language selection in American colleges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关键词: 美国高校外语教育;移民人口;非通用外语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American colleges; immigrants; less commonly taught foreign languages

一、引言

中国高校外语教育以英语为主,语种较为单一,这一弊端已经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相关研究(如王建勤,2011;束定芳,2012,2013;张天伟,2017)建议,应借鉴美国高校外语教育经验,推动中国外语教育语种多样化。但是,当前关于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布局的研究侧重整体概貌描述,缺乏对具体语种分布的细致描写,更缺乏对其背后逻辑的深入分析。本文拟在充分描写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布局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美国高校外语学习者和美国境内各语种移民人口的关系,从当前状况、历史演变和空间分

布 3 个方面,提出移民人口是影响美国高校外语教育语种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该观点成立,那么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在传承文明、促进国际交流、维护国家安全之外,还承担着服务社区居民——特别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的功能。这与中国高校外语教育显著不同。以美国高校外语教育语种布局为参照,推动中国高校外语教育发展的研究和决策,对此差异应有充分的认识。

二、美国高校外语语种布局描述

美国外语教育布局的既有描述侧重整体概貌。王建勤(2011)指出美国高校可教授的外语语种有

200 多种;龚献静、程媛媛(2015)发现 2013 年美国高校教授的非英语语言达到 319 种;张天伟(2017)指出 2009 年美国高校开设的语言课程覆盖 259 种语言,其中非通用外语达到 244 种。这类概况描述未能进一步说明美国高校教授的外语种类和学习者情况等细节。上述相关研究大都利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数据库(如龚献静、程媛媛,2015),或者引用基于该数据库的研究报告(如张天伟,2017)。为更好地与前人研究比对,本文同样利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数据库^①,尝试充分描述 1958 年至 2016 年美国高校的外语^②教育语种分布情况。

数据统计显示,美国高校教授的外语语种多样,学习者人数众多。2016 年,美国共有 2 337 所高校开设 254 门非英语课程,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者总数达到 161 万人^③,整体现状与既有研究的描述基本一致。但是,细致分析显示,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布局还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数据库中,统计的对象是“英语之外的语言”(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课程”(Looney & Lusin, 2018)。这一统计标准与中国语境下的“外语专业”涵盖范围明显不同。其一,该统计中,“英语之外的语言”包括手语和美国手语^④,包括夏威夷语、纳瓦霍语等美国境内民族语言,甚至包括一些语言的方言变体,如路易斯安那州法语(Cajun French)。其二,该统计中,不同语言变体,如“阿拉伯语”“古典阿拉伯语”“埃及阿拉伯语”“海湾阿拉伯语”“伊拉克阿拉伯语”等十几种阿拉伯语的变体,都按照独立的语言课程统计。甚至一些不同用途的语言变体,如“圣经希腊语”“新约希腊语”“拉比希伯来语”等,也按照独立语言课程统计。如果按照“外语”为标准,对这些课程进行大致合并,2016 年美国高校教授的外语种类大约不足 190 种^⑤,数量比按原来的统计方法至少减少 20%。

其次,尽管美国高校外语学习者整体数量庞大,但其学习的语言主要包括西班牙语等十几种语言。2016 年,160 多万非英语语言学习者中,西

班牙语学习者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1.64%)。西班牙语、法语等 14 种语言课程的学习者人数共计 1 569 280 人,占学习者总人数的 96.95%。(见图 1)与之相比,其他 240 种语言课程学习者仅占 3%左右。从学习者人数分布来看,166 种语言课程的学习者不足 100 人,其中 65 种语言课程的学习者不超过 1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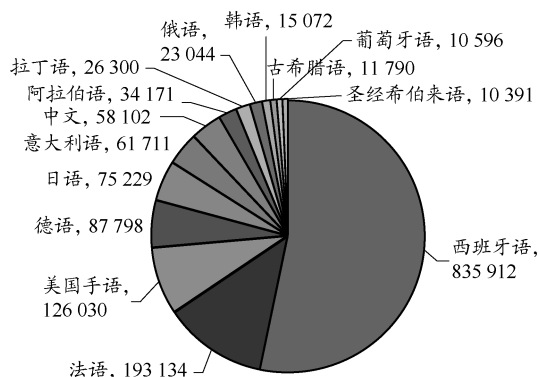


图 1 2016 年美国高校外语学习者人数分布

从历史演变趋势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美国高校外语教育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德语和法语等欧洲语言的学习者人数达到顶峰,之后逐步走低,而西班牙语和中文、日语等亚洲语言学习者数量迅速上升,尤以越南语和菲律宾语学习者增幅最大。(见图 2)以越南语为例,1970 年,美国全部高校越南语学习者数量仅有 18 人,进入 21 世纪以后,急增至 2 000 余人。

综上所述,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尽管语种多样,但实际数值低于前人统计结果;学习者人数分布不平衡,西班牙语等 14 种语言的学习者占绝大多数;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德语和法语等欧洲语言学习者人数减少,而西班牙语和中文、日语等亚洲语言的学习者数量迅速增长。这些现象尚未得到合理解释。

①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2018). Language Enrollment Database, 1958–2016. <https://www.mla.org/Resources/Research/Surveys-Reports-and-Other-Documents/Teaching-Enrollments-and-Programs/Enrollments-in-Languages-Other-Than-English-in-United-States-Institutions-of-Higher-Education>.

② 该数据库统计的是“非英语”(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语言教学情况。为了和前人研究一致,本文同样使用“外语”这一表达。

③ 本文数据来源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数据库,年度数据包括了春季和秋季入学人数。国外的一些统计报告仅包括秋季入学人数,与本文数字略有差异。

④ 在美国,“手语”和“美国手语”分别为两门语言课程。

⑤ 本文主要按照名称识别,将明显类似的名称,如“古代中文”和“现代中文”,合并统计。受专业知识限制,本文无法一一识别不同的地域或方言变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高校教育的外语大约为 190 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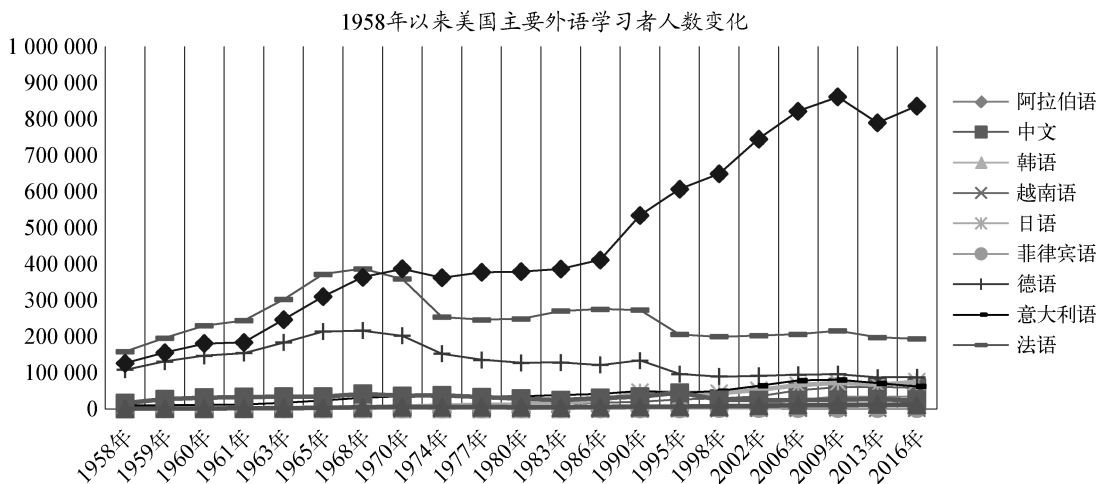


图 2 1958 年以来美国主要外语学习者人数变化(单位: 人)

三、美国高校外语布局的移民人口因素分析

美国高校开设这些外语语种的目的和逻辑是什么?换言之,这些语种是为谁、为何而设?一般而言,外语教育的目的可以归纳为国家安全、实用主义、人文主义和智力发展 4 个方面(Lantolf & Sunderman, 2001)。美国外语教育目的的研究也基本围绕上述维度展开。Brecht(2010)从工具技能和文化认知等方面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美国外语教育的目标。龚献静、程媛媛(2015)从工具主义、人文主义等方面阐释美国高校外语语种多样化的设置逻辑。沈骑(2017)将美国外语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概括为国家利益安全维度、国家经济利益维度和国家文化利益维度 3 个方面。尽管措辞有所不同,相关讨论都是围绕相似的维度展开,认为美国外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国际交往、人文传承和国家安全。但是,无论哪一个维度都无法解释美国高校为何开设数量众多的“非常不通用语种”^①(Truly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无法解释西班牙语教育的绝对优势地位,也无法解释越南语等语言学习者人数的迅速增长。所以,在这些因素之外,必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美国高校外语布局。

美国是世界上移民接收最多的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移民及其后代聚集一地,势必带来语言学习的需求。据此,本文初步假设,除了安全、经济、文化

之外,美国高校外语教育还受到移民人口因素影响。本文拟从人口状态、历史发展和地域分布 3 个方面考察美国移民人口与高校外语布局的关系。

1. 美国高校外语学习者与人口现状的数量关系

不同语言背景的移民为美国高校的外语多样化提供了现实基础。美国国土安全局移民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共有 1 183 505 人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这些移民来自 206 个国家(地区)^②,几乎覆盖了全球所有国家(地区)。由于大量移民及其后代的存在,美国社区语言生活丰富多彩。2016 年,有 6 500 万美国居民在家庭内部使用外语,占美国总人口的 20%左右。(Camarota & Zeigler, 2017)

将美国家庭内部使用的外语和美国高校教授的外语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两者关系密切。2016 年,美国家庭内部使用最多的外语分别是西班牙语、中文、菲律宾语、越南语、阿拉伯语、法语、韩语、俄语、德语和海地法语。(Camarota & Zeigler, 2017)同年,美国高校学习者最多的现代外语分别是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日语、意大利语、中文、阿拉伯语、俄语、韩语和葡萄牙语。两者比较发现,西班牙语等语言既在家庭内部广泛使用,又在高校内拥有众多学习者。在所有外语学习者中,西班牙语学习者占 51.64%。而在家庭内部,西班牙语使用者占 62.29%。与之类似,阿拉伯语、俄语、韩语的学习者数量排名和家庭内部使用人数排名大致相当。家庭内部使用较多但学习

^① 在有些语境中,日语、阿拉伯语等广泛使用的语言,也被划入“非通用语种”中。为此,Gambhir 区分了“非通用语种”(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和“非常不通用语种”(Truly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② 数据来自美国国土安全局《2016 年度移民统计年报》。

表 1 2016 年主要现代外语高校学习者和家庭内部使用人数比较 (单位: 人)

语 言	高校学习 者人数	排名	家庭内部 使用人数	排名
西班牙语	835 912	1	40 489 813	1
法 语	193 134	2	1 216 668	6
德 语	87 798	3	905 691	9
日 语	75 229	4	463 535	16
意大利语	61 711	5	565 154	13
中 文	58 102	6	3 372 930	2
阿拉伯语	34 171	7	1 231 098	5
俄 语	23 044	8	909 374	8
韩 语	15 072	9	1 088 788	7
葡萄牙语	10 596	10	767 210	12
菲律宾语	1 405	16	1 701 960	3
越南语	2 023	14	1 509 993	4
海地语	188	55	856 009	10

者人数偏少的语言是越南语、菲律宾语和海地法语。菲律宾语和越南语的学习者人数未能进入前 10 名,但也拥有一定数量,分别位于第 16 位和第 14 位。家庭内部广泛使用但高校内学习者人数较少的语言只有海地法语。这或许与该语言只是法语的一种克里

奥变体有关。从另一方向观察,美国高校学习人数较多的语言往往也在家庭内部广泛使用。日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 3 种语言的家庭内部使用人数尽管不在前 10 名,但排名也相对靠前,分别是第 16 名(日语)、第 13 名(意大利语)和第 12 名(葡萄牙语)。无论从哪个维度观察,高校学习者人数多寡与该语言移民人口数量关系密切。

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语言学习者数量排名高于家庭语言使用人口排名。美国高校中,法语和德语的学习者人数分别是第 2 位和第 3 位,而 2016 年在家庭内部以法语和德语交流的人口数量分别是第 6 位和第 9 位。这一点可以从移民历史数据和当前美国人口的族裔构成进行解释。尽管近年来,德语、法语移民数量较少,但是这些语言的移民都曾经是某历史阶段大量进入美国,其后代已经构成美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用美国国土安全局发布的《2016 年度移民统计年报》,本文整理了 1820 年以后入境美国的移民情况,并按照语言使用进行分类统计。《2016 年度移民统计年报》以国家(地区)为标准,统计了不同时期来自各国(地)的移民数量^①。(见图 3)

从各语种移民的历史数量来看,德语、俄语、意大利语移民都曾在某个历史阶段形成高峰。1861 年至 1865 年美国内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充实兵源鼓励欧洲移民特别是德国移民来到美国。在几乎整个 19 世纪,德语移民数量遥遥领先其他语种移民数量。

1820 年以来美国接收的主要外语移民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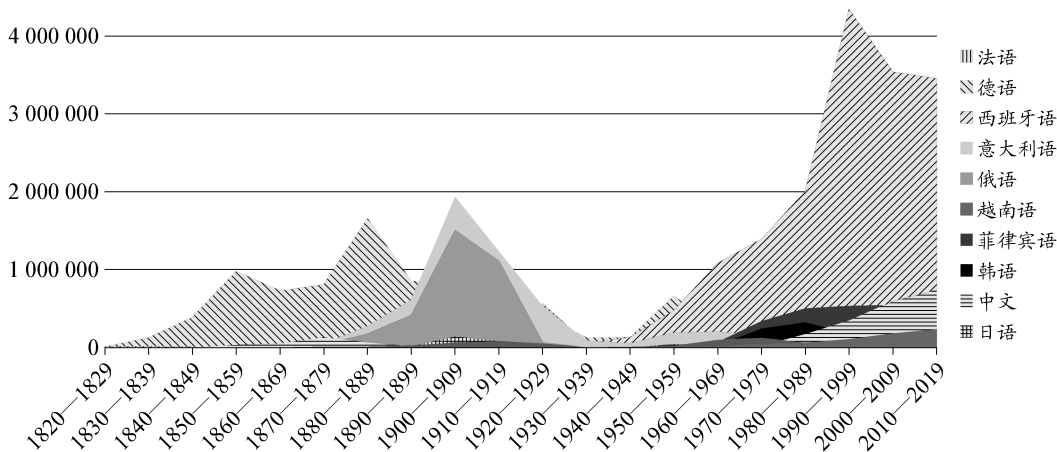


图 3 1820 年以来美国接收的主要外语移民数量(单位: 人)

^① 由于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移民可能来自不同国家,本文以语言使用情况为标准,对移民数量重新进行了分类统计。以法语移民为例,除了法国移民之外,还包括加拿大、比利时等地的移民。对于来自多语国家(地区)的移民,按照该国(地)不同语言的人口使用比例对移民数量进行折算。仍以法语移民为例,来自加拿大、比利时和瑞士的移民并不一定全部讲法语。这 3 个国家内,使用法语的人口比例大约分别是 22%、40% 和 22%。本文将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数量乘以该国法语人口比例,得出法语移民数量。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移民的数量按照同样方法计算。

自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30 年代之前,意大利语和俄语移民大量进入美国。法语移民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一直稳定地占有一定比重。

使用上述语言的移民已经构成了美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 2000 年的人口普查^①显示,英语之外,德语、意大利语、法语语言群体的后裔人数排名分列前三名。在问及“你的祖先是什人”时,德语裔、意大利裔和法语裔^②分列前三位。这些“老移民”(old timer)及其后代是美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其祖国依然保持交往和联系,学习祖语的动机相对更强。与之相反,菲律宾语和越南语移民尽管近年来大量进入美国,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其移民数量对高校学习者数量的影响有待于在更长的历史阶段内观察。

移民人口流动体现了美国与这些欧洲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的紧密关系。德语和法语等欧洲传统语言背后依附传统欧洲文明和文化。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这些语言和文化是美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来源。鉴于历史和文化的密切关联,这些语言在美国高校内一直广受欢迎。人口流动是体现这种密切关系的重要指标。

综合当前家庭语言使用情况和历史移民数据分析,美国高校教授的主要现代外语,要么是当前移民的语言,要么是移民后代使用的语言。前者如汉语、阿拉伯语、韩语等,后者如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整体而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使用不同语言的移民人口构成了美国高校外语多样化的现实基础。一方

面,这些移民在一代或者两代之内,在家庭内部往往继续使用自己的祖语,具有学习和使用祖语的诉求。另一方面,大量的移民人群聚集一处,形成社区国际化的局面,带动社区其他人口的学习需求。美国高校所教授的 200 多种现代外语,尽管很多语言工具价值不大,但大量的移民人口构成了语言学习的潜在需求,是美国高校外语多样化的现实基础。

2. 美国高校外语学习者与移民人口的历史演变

为进一步检验移民人口因素对美国高校外语教育的影响,本文对不同历史时期外语学习者和移民数量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本文中,移民数量数据来自美国移民局发布的《2016 年度移民统计年报》,时间跨度为 1820 年至 2016 年,每 10 年为一个统计单位。高校外语学习者数据来自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1958—2016,每隔 3 年左右统计一次。为方便对比,本文将考察时间统一界定为 1950 年至 2019 年,并通过平均数计算了每 10 年外语学习者的人数^③。

在本文考察的 12 种现代外语中,西班牙语、中文、阿拉伯语、日语、越南语、菲律宾语、葡萄牙语、法语和德语等 10 种外语的移民人数变化趋势和学习者人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④移民和中文学习者数量同步增长。60 年间,中国移民数量增长了 65 倍,同期美国高校内中文学习者数量增长了 61 倍。(见图 4)阿拉伯语、西班牙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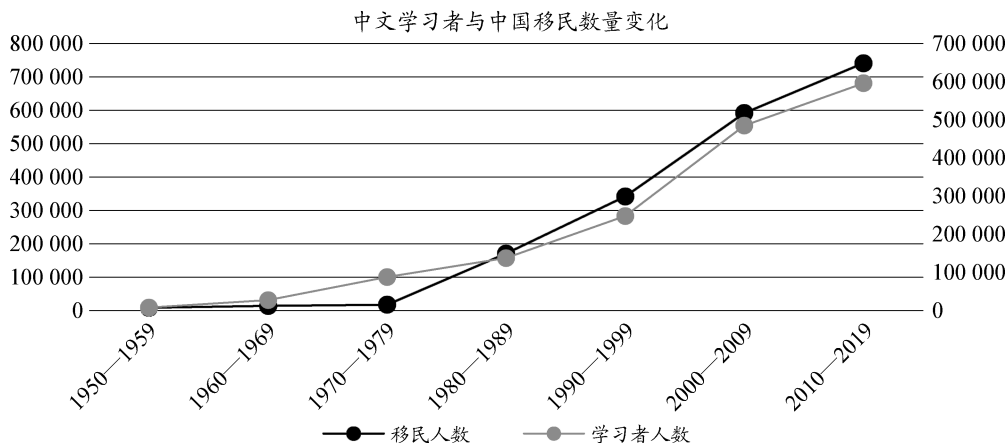


图 4 中文学习者与中国移民数量变化(单位:人)

① <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2000/dec/phc-t-43.html>.

② 该调查为开放式问题,回答多为国家或地区。本文以语言为标准进行分类。法语裔人口除了包括法国后裔之外,还按照国家语言使用情况,包括加拿大、比利时后裔的部分人口。

③ 在美国现代语言学数据库中,1969 年和 1971 年的数据为夏季招生数据,而其他年度为秋季招生数据。两者相差较大,本文剔除了 1969 年和 1971 年的数据。

④ 本文统计数据中,“中国”指“中国大陆地区”;“中文”指“普通话”。

日语、越南语、菲律宾语、葡萄牙语移民数量和学习者数量整体变化趋势也大致相似。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越南和菲律宾移民开始大量进入美国。同期,这些语言的学习者人数一路攀升。2000 年以后,菲律宾移民数量稳定在年均 5 万人左右,高校内菲律宾语学习人数也稳定在年均 1 300 人左右。葡萄牙语的移民数量和学习者数量同步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阶段性高点,80 年代明显下滑、后稳步上升的走势。

德语移民数量和学习者数量的变化趋势类似,但并不同步。德语移民在 20 世纪 50 年代达到高峰,然后一路走低。而德语学习者的人数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达到顶点,然后逐年减少。与移民数量达到顶峰的时间相比,学习者人数达到顶峰后下降的时间点晚了 10 年左右。(图见 5)如果将移民人口数量与 10 年后德语学习者人数对比,两者的变化趋势更加一致。这种滞后影响同样体现在法语移民和学习者数量关系上。与 20 世纪 40 年代相比,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美国的法语移民大概翻了一倍。10 年后,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美国高校内法语学习者实现翻倍。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移民进入美国的年龄不同,其子女也是语言学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国移民数量和学习者数量变化趋势存在差异。进入美国的韩国移民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最高峰后开始回落,但高校内韩语学习者数量并没有随移民数量减少而显著减少。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高校内韩语学习者约为 1 100 人,80 年代增至 6 300 人左右。2016 年,韩语学习者已经达到了 15 072 人,比 2006 年又翻了一番。

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高校学习者数量变化无法反映移民数量的剧烈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美国的韩语移民是 60 年代的 10 倍,从 2.7 万增长至 32 万左右,90 年代又迅速下降至 17 万人左右。(见图 7)高校内外语布局可能无法即时反映短期内移民数量的剧烈变化。当然,进入 21 世纪以后,韩国流行文化的全球传播也是推动韩语学习热潮的重要因素。

在本文考察的 12 种语言中,意大利语是唯一移民数量和学习者数量变化趋势明显背离的语言。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进入美国的意大利语移民数量一路走低,但学习者数量却一路上涨,进入 21 世纪后才出现下滑。

整体而言,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语言移民人口和学习者人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从移民人口的角度,可以解释为何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德语、法语学习者减少而越南语等亚洲语言学习者迅速上升。1965 年,美国通过《移民与国籍法案》(Hart-Celler 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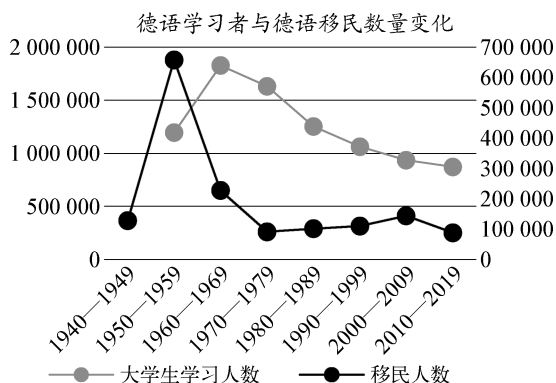


图 5 德语学习者与移民数量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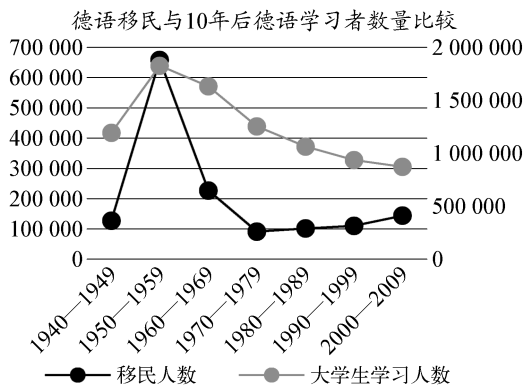


图 6 德语移民与 10 年后德语学习者数量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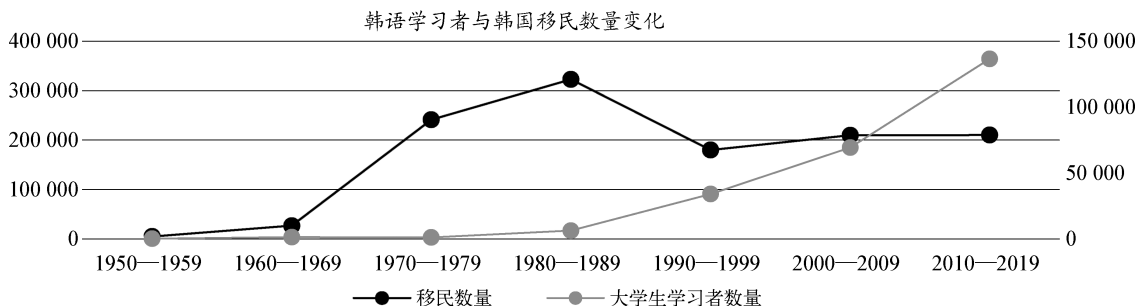


图 7 韩语学习者与韩国移民数量变化

放松了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限制。此后,越南和古巴等亚洲、南美洲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大量不同语言移民的进入,引发或者刺激了这些语言的学习需求。(Kumaravadivelu, 2008)

3. 美国高校外语学习者与移民人口的地域分布

移民人口对美国高校外语布局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相似的历史演变趋势,还体现在相似的地域分布。

美国现代语言学学会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编制了 2010 年各语种移民^①在美国 51 个行政区域的分布情况。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学学会发布的各高校学习者人数,本文以州(特区)为单位,整理了 2009 年不同语言学习者在 51 个行政区域的分布。利用这两组数据,本文考察了学习者和移民人口地域分布的相关性。

在本文所调查的 12 种语言中,学习者和移民人口地域分布存在相关性。显著相关的有中文(0.970)、菲律宾语(0.971)、韩语(0.966)、日语(0.961)、越南语(0.960)、意大利语(0.915)、德语(0.900)、阿拉伯语(0.891)、西班牙语(0.849)、俄语(0.844)、法语(0.804),显著性较低的是葡萄牙语(0.654)。

表 2 中国移民与中文学习者地域分布^②

(单位:人)

	2009 年高校中文学习者人数	2010 年家庭内部使用中文的人数	学习者排名	使用者排名
加利福尼亚	12 464	544 008	1	1
纽约	6 299	282 875	2	2
马萨诸塞	3 627	67 525	3	5
宾夕法尼亚	3 152	48 031	4	7
得克萨斯	2 118	93 084	5	3
俄亥俄	1 812	27 670	6	13
伊利诺伊	1 747	58 802	7	6
密歇根	1 556	28 619	8	12
弗吉尼亚	1 552	35 565	9	11
新泽西	1 533	75 127	10	4
佛罗里达	1 476	35 578	11	10
俄勒冈	1 427	15 742	12	21
北卡罗来纳	1 370	19 570	13	16
华盛顿	1 342	46 445	14	8
佐治亚	1 323	27 288	15	14

数据显示,如果某地一种语言的移民人口众多,那么该地区高校内这种语言的学习者数量相应较大。反之,该语言移民人口较少的地区,它在高校内的学习者数量相应较小。以中文为例,2010 年,家庭内部使用中文最多的地区是加利福尼亚州(544 008 人)和纽约州(282 875 人),两地人数占总数的将近一半。两地高校的中文学习者也是遥遥领先其他地区,分别为 12 464 人和 6 299 人。中国移民人数较少的地区,如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等地,当地高校内中文学习者人数均不超过 100 人。

不同语种数据比较发现,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区,不同语种的移民数量和学习者数量都很大。以绝对数量统计,会受到各地总人口因素的影响,一些数据甚至构成了“离群点”,影响相关性的计算结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考察各语种的移民和学习者数量在不同地区的排名关系。本文考察的 12 种外语中,显著相关的有意大利语(0.945)、日语(0.919)、德语(0.902)、中文(0.899)、阿拉伯语(0.860)、俄语(0.851)、法语(0.844)和西班牙语(0.835),相关但显著性相对偏低的有韩语(0.734)、越南语(0.717)、葡萄牙语(0.607)和菲律宾语(0.555)。

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排名来看,不同地区的移民数量和学习者数量都具有密切关联。当一个地区某种语言的移民较多时,当地高校该语言的学习者也会较多;反之,当一个地区某种语言的移民较少时,当地高校该语言的学习者也会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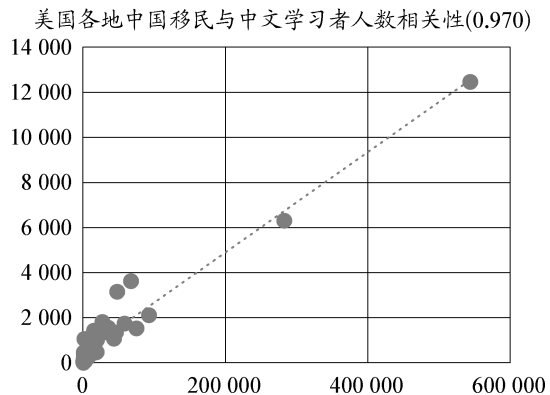


图 8 中国移民与中文学习者人数相关性

^① 原报告中为“在家庭内部使用非英语语言的人”,本文将这些人视为移民人口。由于 2016 年的详细数据尚无法获取,本文使用 2010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与之相匹配,高校外语学习者数据使用 2009 年的数据。

^② 限于篇幅,本文仅提供学习者前 15 名地区的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美国现代语言学学会网站数据进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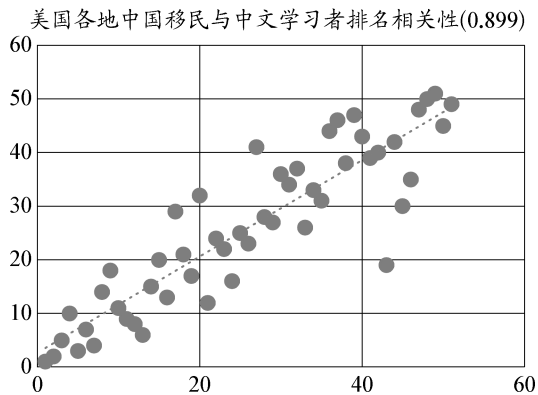


图9 中国移民与中文学习者排名相关性

4. 移民人口因素对高校外语教育布局影响的强度

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布局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沈骑(2017)提出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与这些因素相比,移民人口因素对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布局的影响强度有多大,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由于数据统计期限各不相同,本文暂时无法在统一框架内考察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现仅将移民人口因素与关键外语规划和国际贸易交往做一粗略对比。

与基于国家安全的外语规划相比,移民人口对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布局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美国基于国家安全的外语教育规划始于《1958年国防教育法》。该法案首次使用了“关键语言”这一术语,并将中文、日语、阿拉伯语、印度-乌尔都语、葡萄牙语和俄语确定为关键语言,通过各种资助计划,鼓励教育机构开设这些语言课程。美国现代语言学学会统计数据显示,该法案颁布后10年(1958年至1968年)内,阿拉伯语和日语的增长比例均低于外语学习者总体的增长比例。俄语学习者的增长比例与外语学习者总体增长比例持平。印地-乌尔都语则是在该法案推出7年之后,在美国高校才有注册学习者,而100多人的学习者规模一直维持到了1990年。这些关键语言中,只有中文和葡萄牙语的学习者的出现迅速增长。如前文所述,这两种语言学习者的迅速增长可能与同期中文和葡萄牙语移民数量的迅速增长有关。

与语言的实用工具价值相比,移民人口对美国高校外语布局具有更强解释力。两国的贸易总量是

衡量一种外语的工具价值的重要指标。对比考察移民人口和国际贸易总量对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布局的影响,移民人口比国际贸易总额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第一种情况是,移民人口可以解释外语学习者人数的变化,但贸易额度无法解释。1991年至2016年期间^①,日语、俄语、菲律宾语等的学习者人数增减与移民人口变化一致,而与贸易总额占比变化方向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日、美菲贸易总额在美国贸易总量中的比例逐年走低,但美国高校内日语和菲律宾语学习者的数量及美国接收这两种语言的移民数量一直在增长。与上述情况类似,该时间段内美葡、美德国际贸易额占比较为稳定,但学习者人数随着移民人口变化而同向变化。美国高校内德语学习者随德语移民的减少而减少,葡萄牙语学习者随葡萄牙语移民的增长而增长。上述情况中,移民人口可以解释外语学习者人数的变化,但贸易额度无法解释。

第二种情况是,移民人口和贸易总额都可以解释高校内外语学习者人数变化。在这一时期,中文、越南语等语言的移民、学习者、美中(美越)贸易额占比三者同向增长,表明移民人口和贸易总额对高校外语学习者数量变化同样具有解释力。

还有一种情况是,移民人口和贸易总额均无法解释高校内外语学习者人数变化,如意大利语。在这一时期,美意贸易额和美国接收的意大利语移民都在减少,但美国高校内意大利语的学习者却在增加。

上述分析表明,在解释美国高校外语布局方面,移民人口比语言规划和贸易总额具有更大解释力。

需要说明的是,影响美国外语教育语种选择的诸多因素,如国际交往、历史传统、国家安全,以及外语本身的使用价值共同起作用,影响美国高校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在这些因素之外,本文提出移民人口因素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但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无意夸大该因素的作用,移民人口因素无法单独或者取代其他因素解释美国外语教育的语种分布问题。各项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外语教育语种布局需要进一步考察。

四、中美外语教育的差异

近年来,中国高校以美国高校外语教授的语种数量为参照,大力推进外语语种多样化。通过对外

^① 世界银行目前公布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数据始于1991年,所以本文的考试时间界定为1991年至2016年。

语教育和移民人口的关系考察,本文认为美国高校之所以教授大量“非常不通用语言”,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境内生活着大量移民,美国教育政策具有响应移民需求的特征。与美国不同,中国外语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国际交流,对于许多“非常不通用语言”而言,中国社会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学习需求。

美国一直是接收移民最多的国家。祖语传承的相关研究(如 Gambhir, 2008; You, 2001 等)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具有学习祖语的天然需求,是美国高校外语学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Gambhir (2008)的调查中,80%的印地语学习者均为祖语使用者,即来自印度移民家庭;在 Seymour-Jorn (2004)的调查中,所教授的阿拉伯语学生中,具有阿拉伯语家庭背景的学生占到40%以上。其他非通用语言教学的调查(如 Howard, Reynolds & Deák, 2009; Husseinali, 2006; Johnston & Janus, 2003)同样发现,在美国高校的非通用外语教学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相当一部分都来自移民及其后代。其中,实用价值较低的语言,移民后代占学习者的比例更大。大量不同语种移民及其后代的存在,一方面创造了学习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这些语言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师资。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移民语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移民语言从“问题”转为“资源”。(Ruiz, 2010)相关研究(如 Wiley, 2005、2007)呼吁支持和充分利用丰富的移民语言,满足社会对相关语种能力的需求。在语言资源观的影响下,各种非通用语言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尽管没有统一的政策文本明确阐明美国外语教育承担服务移民的功能,但一些重要文件已经体现了这一理念。例如,在美国基础外语教育的5C标准中,社区标准(community standard)就论述了通过学习世界语言与社区其他人口交流的重要性。《加利福尼亚州中小学公立学校世界语言学习标准》(*The World Language Content Standards for California Public Schools*)中,“外语”这一用词被“世界语言”所代替。该文件解释道:加利福尼亚州当地学生多样,语言、文化背景各异;学生学习世界语言,可以和州内不同人群沟通交流。

美国的教育历来具有高度自治的传统,外语教育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整体而言,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向来缺乏自上而下的规划,基本上是放任自流。(Roca, 1999)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的外语

教育注重应对社区居民的诉求。社区内,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及其后代往往具有使用和学习祖语的诉求。而大量移民的存在增加了社区其他居民接触、使用该语言的机会,提高了该语言在当地的实用价值和吸引力,刺激形成新的学习需求。当社区居民的诉求遇到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美国高校的外语教育布局自然就会受到社区人口演变和分布的影响。美国高校外语教育语种分布的现状,与其说是“自上而下”国家外语政策规划的结果,不如说是“自下而上”响应社区居民需求的结果。

相比较而言,中国接收的移民数量较少。根据2018年《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在中国大陆地区只有约100万境外移民,迁入大陆的境外出生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0.07%。(王辉耀、苗绿,2018)对于许多“非常不通用语言”而言,中国社会既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学习需求,也缺乏足够的教学资源。

中国高校外语教育一直以服务国家外交、外事、外贸为主要目的。无论是早期的“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①,还是当前的“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②,中国的外语教育始终围绕国家改革开放,以服务对外交流为主要目的。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外语教育一直比较重视教授语言的实用工具价值。而近年来各高校增设的许多外语专业实用价值偏低。(Gong & Guo, 2019; Han, Gao & Xia, 2019)基于中美外语教育的差异,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应立足本土实际,根据自身需要稳步推进外语语种多样化。

五、结语

本文在宏观历史社会背景下,通过考察美国高校不同语种学习者和移民数量的关系,发现美国高校外语布局与移民人口特征密切相关。本文重点提出在经济交往、语言使用价值等因素之外,影响美国外语教育语种布局的另一项重要因素是移民人口因素,这一点需要引起外语教育规划者的重视。

本文认为,借鉴美国外语教育经验,不能照搬照抄一些具体做法,盲目扩充语种数量,而是必须了解其背后的逻辑。中美两国社区人口构成差异巨大,以美国高等教育语种多样化作为参照推进中国高校外

^① 教育部关于印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的通知((79)教高一字027号)。

^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

语改革的研究和决策,应对这一差异具有清醒的认识。

本文考察周期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今。这段时间内,美国对移民语言的态度较为包容,甚至将移民语言视为重要的资源。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对移民语言没有采取同化措施。本文的观点也主要限制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不同部门,统计周期不一。美国移民局发布的移民数据始于 1820 年,早期每 10 年发布 1 次;美国家庭内部使用语言的数据较完整版本仅见 2010 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发布的高校外语教育数据始于 1958 年,每 2 至 3 年发布 1 次;世界银行发布的贸易数据始于 1991 年,每年发布 1 次。所以,本文无法严谨表述各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和影响程度。这一局限性有待于在数据丰富后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 [1] Brecht, R. D. (2010).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Nation's Interest: Why? How? Who Is Responsible for What?".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2), 264-265.
- [2] Camarota, S. A. & Zeigler, K. (2017). "65.5 Million U.S. Residents Spoke a Foreign Language at Home in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is.org/Report/655-Million-US-Residents-Spoke-Foreign-Language-Home-2016>.
- [3] Gambhir, V. (2008). "The Rich Tapestry of Heritage Learners of Hindi." *South Asia Language Pedagogy and Technology* 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media/files/salpat.pdf>.
- [4] Gong, T., & Guo Y. (2019) "A Critical Review of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Development: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Needs." *Circulo de Linguistica Aplicada a la Comunicacion*, forthcoming.
- [5] Han, Y., Gao, X., & Xia, J. (2019) "Problematis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Non-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Journal and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
- [6] Howard, K. M., Reynolds, R. R., & J. Deák. (2009). "Who Studies Which Language and Why?: A Cross-language Survey of First-year College-level Language Learner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7: 1-39.
- [7] Husseinali, G. (2006). "Who Is Studying Arabic and Why?: A Survey of Arabic Students' Orientations at a Major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39, 395-412.
- [8] Johnston, B., & Janus, L. (2003).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Minneapolis, MN: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Retrieved from <http://101.96.10.63/carla.umn.edu/LCTL/resources/survey/surveyReport.pdf>.
- [9] Kumaravadivelu, B. (2008).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0] Lantolf, J. & Sunderman, G. (2001). "The Struggle for a Place in the Sun: Rationalizing FL Stud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5, 5-25.
- [11] Looney, D. & Lusin, N. (2018).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ummer 2016 and Fall 2016: Preliminary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la.org/content/download/83540/2197676/2016-Enrollments-Short-Report.pdf>.
- [12] Roca, A. (1999).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Case of the State Florida." In Huebner, T. & K.A. Davis (ed) *Soci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he USA*.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House.
- [13] Ruiz, R. (2010). "Reorienting Language-as-Resource." In J. Petrovic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Bilingual Education*.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155-172.
- [14] Seymour-Jorn, C. (2004). "Arabic Language Learning among Arab Immigrants in Milwaukee, Wisconsin: A Study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s."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24, 109-122.
- [1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17)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16*. Washington, D. C.: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17.
- [16] Wiley, T. G. (2005). "The Reemergence of

- Heritage and Community Language Policy in the U.S. National Spotlight.”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9, 594-601.
- [17] Wiley, T. G. (2007). “The Foreign Languag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Heritage and Community Languages the Remedy?” *Critical Inquiry in Language Studies*, 4, 179-205.
- [18] You, C. (2001). “Heritage vs. Non-heritage Issues Revisited.” In J. Ree (ed), *Korean Language in America*. Honolulu, HI: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Korean. 275-284.
- [19] 龚献静、程媛媛. 美国高校外语语种多样化发展的哲理基础与路径探析——兼论我国高校语种多样化的实现路径.《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04): 64—69.
- [20] 沈骑.《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国际比较研究》.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 [21] 束定芳.《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 [22] 束定芳.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与布局的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45(03): 426—435.
- [23] 张天伟. 国家语言能力视角下的我国非通用语教育: 问题与对策.《外语界》, 2017(02): 44—52.
- [24] 王建勤. 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06): 31—37.
- [25] 王辉耀、苗绿.《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脱欧”背景下欧盟语言规划的困境与出路^①

陈 宇 沈 骑
(同济大学)

摘 要: 欧盟自成立以来推行多语主义的语言政策,但在落实中官方语言、工作语言、通用语言之间却存在明显不对等性,从而给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生活实践带来困惑乃至冲突。英国“脱欧”无疑将改变英国和欧盟的语言格局,因而重新审视这一政治变迁进程中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有关的基本命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国“脱欧”公投后媒体对欧盟语言政策走向的报道为切入点,分析了上述不平等性,认为学界现有的各种单语或多语改革建议均不尽完善。后脱欧时代无论英语的功能和地位如何变化,欧盟语言规划治理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lingualism. However, there are obvious inequalities between the official languages, working languages and *lingua franca*, which brings confusions and even conflicts to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practice. Brexit will undoubtedly change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of the UK and the EU, and thu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re-examine the basic propositions related to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in this political transition.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 reports of the EU language policy after the British Brexit referendu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bove inequalities, arguing that the various monolingual or multilingual reform proposals existing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re all insufficient. In the post-Brexit era, no matter how the function and status of English change, EU language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will face enormous challenges.

关键词: 欧盟;英国“脱欧”;多语制;语言规划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Brexit;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planning

一、引言

目前欧盟有 28 个成员国、24 种官方语言,境内还有 60 多种区域语言或小族语言,随着移民群体的不断扩大以及近年来难民的涌入,还有多种非欧盟本土语言,社会多语现象普遍存在。在如此多元复杂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多语政策的落实在欧盟机构内外都存在很大差异,英语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与法语和德语等其他大语言的差距不断扩大。

对于欧盟语言政策,国内外已有诸多研究,涉及多语制实施、语言教育、语言权利、语言与文化认同等多个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多为基于文献数据的

宏观分析(如戴曼纯,2017;田鹏,2015;傅荣/王克非,2008等),国外学者则视角多样,不乏实证调研结果。针对英语霸权这一焦点问题,语言政策应出于语言平等的原则削减英语的影响还是支持英语作为通用语从而增强人口流动性和经济竞争力,历来各家看法不一。

英国“脱欧”使得欧盟内英语母语人口基数骤减,与英语现有的统治地位极不相称。新的语言格局是会引发新一轮语言竞争还是为制定更为平等合理的语言规划提供了契机,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语言问题正引起国外学界关注。目前主要是英国学者开始讨论英国面临的语言规划和治理问题(Kelly, 2018),而针对欧盟语言政策走向的研究还很少。

^① 本文得到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基金项目号 22120190034。